

小说改编成话剧的多种可能

——观话剧《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

红孩

当今的文学是眼花缭乱的。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作家相比,今天的作家很少不被商业化所浸染。几年前,我曾撰文《散文进入商业化写作时代》,有个别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跟我进行了多次辩论。人家的意思是小说进入商业化写作的可能性大,而散文和诗歌就相对弱些。我说文艺评论呢?对方不置可否。

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面前,谁也不是圣人。在谈论文化产业已经很响亮的今天,最核心和最突出的问题,不仅是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关键是人的被产业化。过去,一个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是不屑于把自己的劳动价值用商品或货币来做衡量的。记得在八十年代初,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光有了理论上的认同,还不足以具体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很快,就有了职称的评定。于是乎,很多单位出现了工程师比厂长工资高的现象,知识分子从而有了扬眉吐气的日子。然而,知识分子的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坚持多久,随着一批批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博士生纷纷走入社会,原来知识分子优越性已经不复存在,而更受青睐的是公务员的部级、局级、处级、科级,至于民营企业,才不管你是什么学历与职称,主要取决于你的业务能力。当然,就社会的整体而言,有了高学历与职称,在应聘上起码是取得准入的证明,至于实效如何,那就看个人的能力了。

多年来,我们一直惧怕讨论“劳动力是否成为商品”这个话题。认为,人一旦成为商品,人的尊严就要被损害。但问题是,不管你是否回避,已然成为最真实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商品,这是不争的事实。记得在八十年代初,围绕民营企业到底可以雇用多少人为人,有的说三人以内,有的说八人以内,超过这个数就被视为剥削。而剥削这个词,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出现的,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会有。对于这样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基层具体实践中,一直是被困扰的。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特别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和胡锦涛同志“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必须解放文化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的核心主体是文化人,人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所以,我对文化领域的改革,尤其是文化人的选择一直非常关注,譬如出版社、报社的改革,文艺院团的改革,演出市场的改革,哪怕是稿费的多寡,我都非常关心。我向来看领导在媒体上怎样激情表态,我只看身边从事文化工作的人群他们的脸上是否洋溢着幸福,我这也是从中央电视台上学来的,人家记者不是多次拦住观众问:你觉得你现在幸福吗?

六月十八日晚,应朋友之约,在北京东城区文化馆三楼剧场观看了女作家方方根据自己的小说《大树皆秋色》改编的话剧《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方方的小说我是熟悉和喜爱的,此前也看过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作为话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剧场大厅,我取了一本这部戏的小说和剧本编在一起的书,在剧本的封面上赫然打着“雅皮剧”三个字,我看了感到很陌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时联想到的是轻喜剧。回到家,在电脑上百度搜索,得出的答案是——“雅皮风格是典

型的经典主义,在迷乱的都市中雅皮风格始终得到优雅人士的欢迎。没有浮夸的表现、没有庸俗的媚俗、没有俗套的装扮,“高层次”的品位是最重要的,在繁杂的人中,雅皮本身就是亮点。绝不与人雷同是雅皮们必不可少的要求,高雅的外表装着精致的生活。”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方方在中国地质大学演讲时所说的一段话,这或许可以诠释这部话剧的创意者为什么选择方方的小说作为“雅皮风格”的“第一主打”了——“我认为,我和池莉还是有所不同的,这好比两台电脑,我和她是一个人的模式,我的读者要比池莉的读者要少许多,我的文学观和她有所不同,我认为她是现实主义的作家,而我则更倾向于理想主义,在写作的时候总是对现实有一些不满。”其实,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没有绝对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作家在写作时常常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当中,离开现实谈理想是空洞的,没有理想谈现实是枯燥的。就以《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为例。这部话剧显然是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的代言写作,不管是大学教授还是大学生,他们的生活表面是发生在校园里,尽管在爱情、家庭、升职、乔迁等问题上带有浓郁的校园特点——即知识分子生活,但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舞台上考量,你会发现这个校园特色并不是封闭的,它与整个社会还是一个整体。

我注意到,这部话剧采用小剧场形式,人物少,服装道具简单,吸引人靠的是演员大段的台词和旁白的叙述衔接,应该说,演员的工夫是没少下的。但问

题是,整部话剧看下来,给人的感觉还是小说味儿十足,戏剧效果并不是很强烈。说白了,整出戏是用戏剧的形式在演绎小说。我不了解,方方在之前是否写过话剧剧本。想必电视剧剧本是写过的。这里就有一系列问题要讨论,即小说是否都可以改编话剧?话剧剧本是否要忠于小说原著?小说作者改编自己作品是否带有局限性?诚然,有人曾提出,郭沫若、曹禺、老舍作为文学大家,都以经典的戏剧而屹立于中国文坛。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大师们所创作的话剧几乎都是直接创作的,而不是改编自己或他人的小说。历史已经证明,把小说改编成话剧成为经典的非常少,鲁迅、茅盾等人就是例证。当然,我不反对当代作家做这方面的尝试,萧红的《生死场》、陈忠实的《白鹿原》应该算是相对成功的,但离经典似乎还有很大的距离。

《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的出品单位为光谷·17排剧院,联合制作单位为《长江文艺》杂志社和武汉市艺术学校,其在二〇一三年上半年已经推出的改编剧目陆续有《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桃花灿烂》、《有房子的人》、《男人游戏——斗地主》等七部戏。我因不在武汉,无缘看到这七部戏演出后在观众中的真实反应。就我个人而言,看到有这么一个团队,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定位和艺术追求,在艺术生产和产业运作上做着某种探索和尝试,无论如何都应该值得称道,被加以肯定。至于这些艺术品能否在多年后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因为,谁最初的创作都不是奔着经典去的。

近日,声称学画不到三个月的女作家盛可以在微博上办起个人画展,一平尺左右的小画儿每幅售价五千元,据说还将出版画册。而近些年,不少作家、诗人都摸起画笔,跨界作者专业素养的普遍缺失,使他们无法真正达到专业水平而只能停留在业余爱好者的层面上,现在的这些“文人画”只能说是小打小闹,大多数画作难以进入专业市场、与科班出身的艺术家的作品相媲美。(《南方日报》六月二十三日)

说画画的女作家不是“科班出身”,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无论是盛可以还是赵丽华,乃至被达到书画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做这方面尝试的萧红、陈忠实的《白鹿原》应该算是相对成功的,但离经典似乎还有很大的距离。《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的出品单位为光谷·17排剧院,联合制作单位为《长江文艺》杂志社和武汉市艺术学校,其在二〇一三年上半年已经推出的改编剧目陆续有《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桃花灿烂》、《有房子的人》、《男人游戏——斗地主》等七部戏。我因不在武汉,无缘看到这七部戏演出后在观众中的真实反应。就我个人而言,看到有这么一个团队,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定位和艺术追求,在艺术生产和产业运作上做着某种探索和尝试,无论如何都应该值得称道,被加以肯定。至于这些艺术品能否在多年后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因为,谁最初的创作都不是奔着经典去的。

古代王冕放牛时自己临摹荷花,欧阳修小时候以荻草代替毛笔练字,最终都取得了较高的造诣。古代的文人多擅长写字作画,但他们并不以艺术创作为主业,也很少有人多年专业研习艺术,练习字画只是读书和从政时的副业,有的甚至还是武将,换句话说,没有几个是科班出身的,可谁会认为那些古代书画大家只是“业余爱好者”呢?现代专业美术教研机构的设立,虽然有助于艺术人才的培养,但实事求是讲,在相当程度上也为艺术创作设置了人为门槛,甚至于一定程度上,学院环境还对创意起阻碍作用。

至于说有的作家“跨界”拿画笔,是打着画画的幌子钻营谋利,就更不值了。钻营谋利从来不是艺术领域独有的,也不会有许多官员、老板还有社会混混儿,出版文学作品或者弄各种学会的头衔吗?就是所谓科班出身的书画界人士,包括一些美术学院的教授,书协、美协的领导中间,滥竽充数、钻营谋利的难道少吗?只要不是用权力吹捧、再利,作家画画、卖钱谋利、谋利都无可厚非。杨小彦认为大众关注作家、明星的画是附庸风雅,他们其实根本不懂艺术,可大众凭什么不能附庸风雅,艺术的标准凭什么要由学院派垄断?

最后笔者还想简单说一下“文人画”。很多人把作家的画称为“文人画”,其实是一种误解。文人画,本是明末画家董其昌提出的一个专门术语,又称士大夫写意,代表画家是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涛等,多以梅兰竹菊、山水为题材,画中寄托着独特的人文情趣。今天有些作家要画“文人画”,无疑是有先天优势的。但即便他们中很多人是随性作画,水平参差不齐,也能打破工匠画和院体画的一统天下,让画坛风气更为清新、开放。仅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也欢迎更多作家乃至其他行业的人,“跨界”拿起画笔,为人生和社会增添色彩和情趣。

作家画画不必大惊小怪

李清

首先,无论是画画还是从事其他艺术创作,都是很个性化的行为,没有一元评价标准。笔者比较同意谢有顺的观点:“专业书画家不必因自己的专业素养而产生优越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还是要看艺术的新颖和个人的发现。”科班出身的书画家,可能在技法上强一些,但不代表他们的作品就好、价值更高、更值得收藏。毕竟,就像文学作品主要评判权在读者,对书画作品的评判也由观者决定。读者欣赏、购买文学作品,有多少人关心作者是否是中文系出身呢?其次,艺术虽然需要天赋与训练,却原本并没有什么门槛的,所谓科班出身只是现当代才有的。

“就是没有一个鼓”

阎纲

某月某日,远离首都的某城,某人,哭告无门,急中生智,按民间流传的老办法“拦轿告状”,跑到衙门口拦小轿车递状纸,当场被捉,从此,下落不明。究竟多大的罪?要看拦的是什么车。我想,拦“丰田”要比拦“上海”的罪大,拦“奔驰”又比拦“丰田”的罪大,“官”越大,“民”罪越大,虽然不是民法,恐怕也是事实。

车上的公仆何不替小民开腔几句放他走人?要不,你收下状纸不也很好吗?然而,他被请去了。“状纸进门,两头托人”,对平头百姓说来,不敢奢望“托人”,能让状纸“进门”就谢天谢地了。总之,人和状纸都被弄走了,马路上重归于安定。

事过多日,不该忘记的只好忘却。今日天气晴和,暖阳融融,伏案开卷,开卷有益,偶见一九七九年第九期《人民戏剧》,第三页载有周恩来总理这样一段话,照录于下:“……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有些制约的办法也是可取的。如况钟去见周忱,周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就是没有一个鼓……目前我们一些制度是有缺点的,老百姓要见有的做官的多

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想,是不是真在为人民群众服务。周总理所说的“鼓”,是指古时候官府大人听取冤抑的“登闻鼓”,闻鼓升堂,受理诉讼。古代官吏都是青天大老爷么?姑且不论,反正他们“闻鼓升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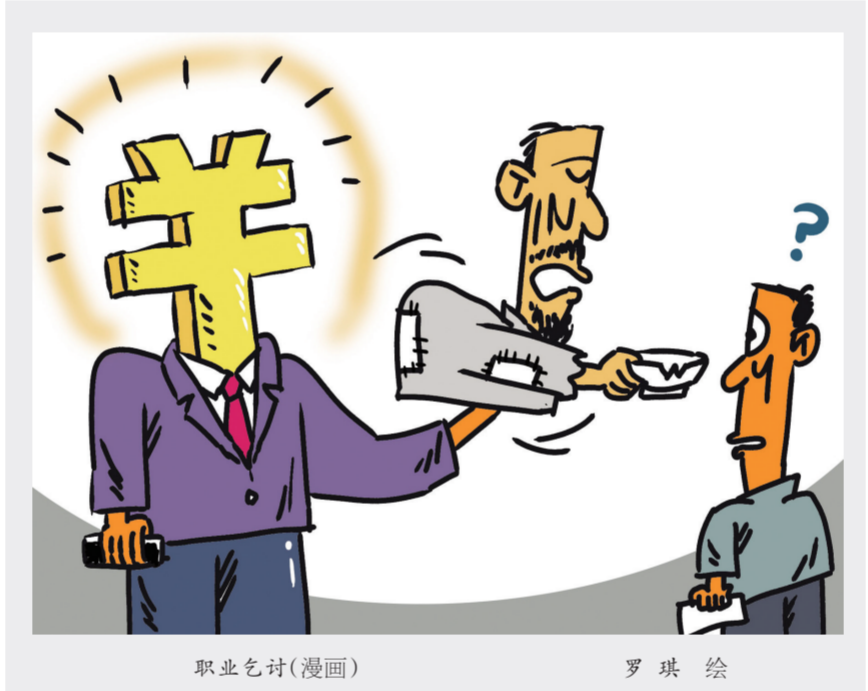
《四进士》里的宋士杰,为了替女儿申冤,击鼓喊冤,硬是把三个大官告倒了,尽管挨了四十大板差点没有被“边外去充军”。“老百姓要见有的做官的多难啊?”所以,总理让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为人民服务”?

那位坐小车的官“是不是真的为人民服务”?那位递状纸的何不在他的衙门口去“击鼓”?要有“鼓”他是不是就不去拦那个车子?我想知道。我想的是这样三件事:一、周总理坐“红旗”,比“奔驰”的官大。二、周忱并不是共产党员。三、天凉了,家属的夹衣该送到什么地方去。(注:本文作于一九七九年九月,选自《惊叫与诉说》)

事实存在。譬如,有些名胜之地,特别注明对“省级以上摄影家协会会员”免费接待,无非是看中了其风光摄影的“投桃报李”;又譬如,一些景区专门对某些姓氏和属相的游客优惠打折,大概也是为了“出奇制胜”地吸引公众眼球、催热舆论聚焦……由此而论,南阳推出的“名落孙山免费游”,尽管未必会引得所有落榜者愿去领取这份“安慰奖”,至少也是利大于弊,体现了一种温暖关怀的公益善心。

坊间网议,对于“名落孙山免费游”的有赞有弹,要说是种十分正常的反应。而我记得,这样的善意炒作,能否取得“益人利己”的促销效果,关键还得看高考落榜者的接受程度。所以,旁观者尽可能冷静热议,但切忌将一己之思和人个人观点视作“代表孙山”的权威声音。换言之,南阳的这番旅游公益策划,其高明、成功与否的终极评委,并非那些说三道四的“场外观众”,而只能是遭遇了“高考滑铁卢”的落榜考生们。

跳出景区宣传的狭隘思维,人们还应想到,这些年来,每到高考成绩金榜公布之后,商家炒作等的社会渲染,往往总会习惯成自然地围着“状元”“准状元”造话题、作宣传;而相比之下,像南阳市旅游局那样,通过对“孙山一族”的免费接待,独辟蹊径地尝试一种善意炒作,其积极意义无疑更胜高人一筹。



今年是曹雪芹先生去世二百五十周年。据学者考证曹雪芹约生于一七一五年,约死于一七六三年,这已是红学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我的续作能在今年发表出来,也算是我对他与我自己心灵的一个告慰,更算是以此对曹雪芹先生的一种纪念。

每当我面对《红楼梦》时,我常会追问“红学”怎么形成,人们虽然有多种解释,但都在不约而同地为完善残缺的《红楼梦》而努力。而《红楼梦》在程高本之前,世人能找到的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的,都是些残缺的叫“石头记”、附有脂批的残抄本。这是由于抄写时的误写还是其他原因?每一个抄本都有异同,都可以认为是

我在《红楼梦》八十回后真相还原前言《我这样续写了〈红楼梦〉》里已经做了说明:“作家与学者的真正使命就是不断地提升和升华本民族以及世界的文化,或使一部又一部前人的伪文化经典不断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或普及一部又一部前人永恒的经典,不断让本民族乃至世界认识。同时让一部又一部更伟大的新的经典不断诞生。这也许是我续红的真正冲动与勇气。”想想古代的艺术作品,除了诗词短章还完整外,其他重要的能称其为伟大的作品,总是有一些留下残缺的遗憾,就如同历史留给我们的废墟一般。面对此种情景,我们所做

的只有不断“考古”寻真。对于历史的器物,有的埋于地下,没被盗贼光顾的也许有完整之物。而关于文字的,却只见于片断,不被埋于地下的,也被抛至民间,留下的也是断章残页。有时伪作充于其间,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只有不断考证辨别。为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得到弘扬,只有低下头来,极小心翼翼地修残补缺,使之“是真”的完整呈现于世,流芳万代。”

我凭着这样的勇气写出了续红之作——二十回《红楼梦》八十回后真相还原。六月发表在浙江杭州一个季刊杂志《浮玉》(二〇一三年二期头条)上。在发表前曾编陈月华老师告知,我的题目被总编潘庆平先生改为《新编续八十回后红楼梦》,把前言放到后面变成后言了。得到这消息后,我思虑良久,表示理解。毕竟我是以程高本后四十回为底本进行修补还原的,他们这样改题目也有一定道理。从学术上看也过得去,但是不太适合读者的胃口。我曾在文学群里在一些朋友间做过调查,都认同《红楼梦》八十回后真相还原这个题目。

到写作此文,可以说《红楼梦》已是我心中那座无形的建筑王国中的一部分,因为我续写《红楼梦》缘起就是我在写作一个多年的长篇小说,在完成初稿修改几遍后,觉得要怎么使这个主人公看上去很有才能,我想了无数个方案,觉得让这个主人公续《红楼梦》,但又不能太长,这一想自然触动了多年阅读程高本后四十回的一个发现:发现无数曹雪芹原笔藏于其中,为何不以此挖掘出来。所以也就毫不顾忌“红

学”理论束缚,根据自己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理解,加之对李少红版《红楼梦》电视剧中人物声口的领悟,陆续写了出来,名为《续写〈红楼梦〉大结局——第八十一回〈林黛玉焚稿潇湘馆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文稿被一些好奇的朋友看后,夸我“真如曹雪芹再世”,鼓励我投稿。投稿出去,没想到《延安文学》杂志二〇一一年第二期头条发表了。自章学锋先生在《西安晚报》二〇一一年三月三日第十三版用题为:“《延安文学》重磅推出草根版《红楼梦》大结局”作了独家报道,接着《成都商报》也在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四日“今日一条”栏目中发布了这条消息,在网上引起了一些反响。接着《延安

文学》主编魏建国老师多次在我与他的通电话中鼓励我多写几回,说,以我的笔力多写几回,那样才更显大气,如今想起来确实感动。在魏建国老师的鼓励下,随着我的“续红”随笔《我为什么续〈红楼梦〉》二〇一二年贵州贵阳《红楼梦研究》学术季刊第一期发表,我又翻阅了很多关于“红学”方面的书籍,于是开始大胆地续写还原起来。续写还原后名为《续八十回后〈红楼梦〉》结局真相第八十一至一百回。我认定《红楼梦》应是一百回,一是根据脂批的提示,在蒙藏本第二回脂批中有“以百回之大文……世态人情,尽盘旋于其间,而一丝不乱,非聚龙象力者,其孰能哉”的话;在庚辰本第二十五回脂批中有“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何再言?借道踪迹虚实,幻笔幻想,写幻人于幻文也”的话;在庚辰本第四十回回前脂批中有“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

之一余”的话。从这些脂批中可见曹公《红楼梦》原本只有百回文字。二是根据《红楼梦》甲戌本第二十八回脂批中有眉批云:“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并且有很多学者认同《金瓶梅》是《红楼梦》的“前辈”。而《金瓶梅》却有百回,而俞平伯、周汝昌与刘心武先生也认为是一百零八回,我认为一百回更有道理。读久了,我觉得曹公《红楼梦》的这百回文字的残章断页应是被高鹗与程伟元为了我们难以说清的目的如碎玉一样粉碎在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程高本的汪洋之中。但我不是生硬去套回数,因为根据程高本后四十

二百五十年后假如曹雪芹先生有知

唐国明

有人极端地否认一百二十回程高本,而我不是这样看,程高本可以说也是程高搜罗所有汇校增补出来的,不知什么原因尤其是后四十回在我的阅读体验里,里面藏有很多曹雪芹的原笔。

先生改为《新编续八十回后红楼梦》,把前言放到后面变成后言了。得到这消息后,我思虑良久,表示理解。毕竟我是以程高本后四十回为底本进行修补还原的,他们这样改题目也有一定道理。从学术上看也过得去,但是不太适合读者的胃口。我曾在文学群里在一些朋友间做过调查,都认同《红楼梦》八十回后真相还原这个题目。

文学》主编魏建国老师多次在我与他的通电话中鼓励我多写几回,说,以我的笔力多写几回,那样才更显大气,如今想起来确实感动。在魏建国老师的鼓励下,随着我的“续红”随笔《我为什么续〈红楼梦〉》二〇一二年贵州贵阳《红楼梦研究》学术季刊第一期发表,我又翻阅了很多关于“红学”方面的书籍,于是开始大胆地续写还原起来。续写还原后名为《续八十回后〈红楼梦〉》结局真相第八十一至一百回。我认定《红楼梦》应是一百回,一是根据脂批的提示,在蒙藏本第二回脂批中有“以百回之大文……世态人情,尽盘旋于其间,而一丝不乱,非聚龙象力者,其孰能哉”的话;在庚辰本第二十五回脂批中有“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何再言?借道踪迹虚实,幻笔幻想,写幻人于幻文也”的话;在庚辰本第四十回回前脂批中有“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

回为底本,还原出来的与前八十回正好百回,也似乎是天意。让我一脚踏进“红学”门槛更是天意。因为我在二〇一一年以前几乎不曾想过要做“红学”,只想修建好自己心灵的那座无形的建筑王国。没想到这座无形的建筑王国却并入了《红楼梦》这座社会灵魂还在不断完善建筑王国当中。如今我的续作《红楼梦》八十回后真相还原在二〇一三年第二期《浮玉》杂志上发表后,我更有个心愿,去探求前八十回更逼真的真本,去现今能找到的版本中整理校对出一部唐国明版本的一百回《红楼梦》以献读者。因为前八十回周汝昌、郑庆山先生几乎做出了一辈子的努力,他们留下了成果。每次捧读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自从程高以来到俞平伯再到如今,为完美《红楼梦》这部伟大的著作,工夫没有白费,因而使我更加知道了自己的使命。